

学 | 术 | 史 | 丛 | 书

陈平原 主编

红楼钟声及其回响

—重新审读“五四”新文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学 | 术 | 史 | 丛 | 书

陈平原 主编

红楼钟声及其回响

—重新审读“五四”新文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钟声及其回响:重新审读“五四”新文化/陈平原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

(学术史丛书)

ISBN 978-7-301-15087-0

I. 红… II. 陈… III. 五·四运动(1919)—研究 IV. K261.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3968 号

书 名:红楼钟声及其回响——重新审读“五四”新文化

著作责任者:陈平原 主编

责任编辑:张凤珠 徐丹丽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5087-0/K·0588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8.5 印张 430 千字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小 引

陈平原

1993年5月6日,北大中文系举行“纪念五四学术讨论会”,我在会上做了题为《走出“五四”》的发言,发言稿后来收入《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出版社,1995年)。文中除了强调放宽眼界,将“五四”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的象征;称“五四”建立起来的学术范式为“西化的思想背景、专才的教育体制、泛政治的学术追求、‘进化’、‘疑古’、‘平民’为代表的研究思路”;更主张“尽管意识到‘五四’所建立的学术范式有诸多弊病,还是不敢轻易‘扬弃’,而只是希望‘走出’”。原因是:“‘五四’那代人逼于时势,采取激进的反传统姿态,现在看来流弊不小。今日反省‘五四’新文化,我想,不该再采取同样的策略——尽管那样做更有‘轰动效应’,也更能引起传媒的关注。”

十五年过去了,无论学界还是我本人,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解与阐释无疑更为深入;但面对这一巨大的历史存在,我仍力主理性、审视、通达的学术立场——既非坚决捍卫,也不是刻意挑剔;既考虑新文化人的初衷,也辨析其实际效果;既引入新的理论视角,也尊重对象自身的逻辑。之所以慎重得有些拘谨,就因为在我看来,对于“五四”的任何阐发,都可能影响当下乃至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故不能只图说得痛快。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北京大学的命运密不可分,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重要根基,正是这两点,决定了北大中文系同人常常与之对话——或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或探究“五四”的前世今生及其遥远回响,或站在80年代乃至新世纪的立场反省“五四”的功过得失。诸如此类兼及思想/学术/文化/文学等的论述,十年间,同人多有刊发;借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之机,做一小结,未尝不是好事。考虑到文集的篇幅,每人只收一至二文。至于两种专门著述——严家炎教授的《考辨与析疑——“五四”文学十四讲》(中国海洋大

学出版社,2006年10月)以及我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碍于体例,只是略为涉及。

全书收文25篇,分“‘五四’新文化的多元场景”、“历史大视野中的‘五四’”以及“对话与反省”三辑,各辑文章按发表时间排列,同一作者的文章放在一起。其中有对具体课题的仔细推敲,有学术思路的坦然展示,也有同行间的相互辩难。全书呈“众声喧哗”状态,同人间立场并不一致;甚至同一作者的观点,也可能前后有别。或许,这正是北大人的特点:独立思考,自由发言,勇于挑战权威,也不吝自我修正。此次入集的论文,均由作者本人提供且保留当初发言的姿态;若须修订,均加以说明。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些论述本身,很可能也成了“五四阐释史”上重要的一环,后人可从中辨认某一特定时代的探索足迹。

将同人近十年间撰写的有关“五四”的论文编辑成册,此举既是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纪念,也是一种自我展示。在此意义上,附录的“作者简介”,同样值得关注。只是有一点必须说明,北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教师,在别的学术话题上有精彩的表现、但近十年未撰有关“五四”论文者,只得暂时缺席;至于其他学科的教授,虽有相关论述,碍于体例,没有收录。

一个小小的中文系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含“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民间文学”三个教研室),竟有这么许多学者持续关注“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从不同角度与之展开认真深入的对话,实在令人欣慰。随手翻出1999年的北大“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简介”,抛开那些未能免俗的“自我表扬”,有一段话深得我心:“本学科既有学院派的严谨求实学风,也保持明显的人间情怀,关注当下的文化生态,并积极参加当代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如此学术追求,值得期待。

2008年11月23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目 录

小 引	陈平原(1)
-----------	--------

一 “五四”新文化的多元场景

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	王 风(3)
“五四”前后的林纾	王 风(22)
北大新演剧与“五四”文化批评品格	
——以鲁迅与魏建功关于爱罗先珂的	
笔墨之交为中心	孙玉石(34)
《文学革命论》作者“推倒”“古典文学”之考释	严家炎(66)
“五四”“全盘反传统”问题考辨	严家炎(73)
“起点”的驳议	
——新诗史上的《尝试集》与《女神》	姜 涛(88)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	钱理群(102)
论文学传统在新文学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	方锡德(134)
作为运动与作为学术的民间文学	陈泳超(160)
与北京大学结缘	
——“五四”时期的叶圣陶	商金林(181)

二 历史大视野中的“五四”

挪用与重构	
——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	贺桂梅(213)
1980年代“文化热”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	贺桂梅(231)

回望百年

- 论中国新诗的历史经验 谢 冕(263)
- 中国新文学的宿命 谢 冕(287)
-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两种读法 李 杨(300)
- 理想的困境
- 析台湾话文论争兼及大陆国语运动 计璧瑞(315)
- 1920年代中国新诗发展述略 孙玉石(334)
- 现代文学的阐释链与“新传统”的生成 温儒敏(352)

三 对话与反省

- 漫谈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钱理群(377)
- 文本中见历史 细节处显精神
-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导言 陈平原(382)
- 跨出“五四”:我们需要超越的精神 张颐武(389)
- 何为 / 何谓“成功”的文化断裂
- 重新审读“五四”新文化运动 陈平原(401)
- 想象中的“民族的诗” 陈泳超(408)
- 重建“五四”的历史现场
- 评陈平原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吴晓东(414)
- “以晚清为方法”
- 与陈平原先生谈现代文学研究中的
- 晚清文学问题 李 杨(422)

一 “五四”新文化的多元场景

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

王 风

1912年,民国建元,作为新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第二年召开了“读音统一会”,开始构拟民族共同语的框架。这一会议也可看做持续整整二十年的晚清拼音化运动的大检阅,最后选定了章太炎所拟的“纽文”、“韵文”,略作改动后成了“注音字母”。同时,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了几千个汉字的标准读音。

“国音”算是有了,不过随后几年的袁世凯时期,教育部一直没有正式公布,对外宣称“业已派员清理”,事实上仍是搁在柜子里,“由老鼠和书虫在‘清理’”。^[1]久等无着落的“统一会”在京会员王璞只得自己设法,于1915年成立了一个“注音字母传习所”,宣传并讲授“国音”。

按胡适的说法,也就在这一年夏天,他在万里之外的美国绮色嘉(Ithaca)产生了“文学革命”的想法。一开始他和赵元任分头讨论的也是“中国文字的问题”,赵的论题是“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这是20年代“国语罗马字”的先声;而他则探讨“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在这篇论文中,他开始触及所谓“文字”死活的问题:

汉文乃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腊拉丁,非日用之语言,已陈死矣。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乘马是死语,骑马是活语。故曰半死之文字也。)^[2]

这段文字已明确把白话作为文言的对立面提了出来,只是还没有完全判决文言已死,但已认定白话是“活”的了。

也许正是文白死活对立这一思路,使得胡适的注意力很快就脱离了“文字”问题,转而关注文学问题。绮色佳时期与任叔永(鸿隽)、梅观庄(光迪)、杨杏佛(铨)、唐肇黄(钺)等人的讨论,由于他在《逼上梁山》中以自己为主角的叙述而被完整保留下来。很快,在提出“文学革命”后,他又提出了“诗国革命”,并创作了一批旧体的白话诗。

所谓“文学革命”、“诗国革命”,很容易让人想到晚清梁启超发动的文学变革,从胡适当时的创作看,形式方面当然还是旧体诗词的路数,只是不避俗语,并混入大量外语词的音译,与梁启超主张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相比照,看不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胡适真正形成自己完整的思路,是在1916年。这得益于他用进化论解释中国文学史:

……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之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

……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此亦一革命也……“古文”一派,至今为散文正宗,然宋人谈哲理者,似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语录体者,以俚语说理记事……亦一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说,此体始臻极盛……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对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3]

此类基于进化论的历史观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4]从论文字的死活到论文学的死活,这一思考过程必然使他的注意力集中到“文字形式(工具)”的变革,也就是说,他的“文学革命”重点在文学语言方面。

这边胡适在美国试验白话诗,而万里之外的北京,教育部里的几个人正在酝酿着一场国语运动:^[5]

……那时正当洪宪皇帝袁世凯驾崩于新华宫,帝制推翻,共和回复之后,教育部里有几个人们,深有感于这样的民智实在太赶不上这样的

国体,于是想凭借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底权力,在教育上谋几项重要的改革,想来想去,大家觉得最紧迫而又最普遍的根本问题还是文字问题,便相约各人做文章,来极力鼓吹文字底改革,主张“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在行政方面,便是请教育长官毅然下令改国文科为国语科。^[6]

改“国文”为“国语”,这是清末拼音化运动,尤其民初“国音”制定之后的合理思路。民国二年五月十三日,“读音统一会”议决“国音推行办法”,其中有一条就是:“请教育部将初等小学‘国文’一科改作‘国语’,或另添‘国语’一门。”^[7]此时部中同人不过旧案重提。

只是国语运动发端于教育部这一最高教育机构,让人觉得颇为有趣。文字改革必须依赖行政力量的支持才会有成效,这已为拼音化运动所证明,当年王照、劳乃宣依赖袁世凯、端方,声势浩大,屡屡向学部逼宫,几乎成功;民初之所以能采定“国音”,也是教育部召开了“读音统一会”。光靠民间推行不可能有成果,从卢懋章到此时王璞的“注音字母传习所”,其收效甚微是必然的。

按黎锦熙的说法,“当时作文章鼓吹的人,有陈懋治、陆基、董瑞椿、吴兴让、朱文熊、彭清鹏、汪懋祖、黎锦熙等。而反对最烈的却还不是闽侯林纾先生,乃是吴县胡玉缙先生”^[8],1916年9月至1917年4月间,往返辩驳的文章有十来篇之多。

胡玉缙并不反对在初级教育中增授国语,他反对的是以国语代国文,认为教授国文与教育不能普及没有关系,“各国教育之盛于百年间者,由于强迫”,所以当前亟务在于“多设学校,改良校风,慎选教师,一切设备务求完具”。^[9]就教育而言,普及基于强迫,这个观点确实是正确的,虽然并不新鲜,章太炎早就说过。问题在于胡玉缙过分强调汉语的特殊性,以为西方字母文字,言文可以合一,而“我国文字主乎形义,故言文万不能合一”,^[10]至谓国语为“杜撰官话”、“集成官话”。^[11]

胡玉缙认为国语不能代国文,除了“拼音字可一致形义字万不能一致”之外,^[12]还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背景,他举“吴楚闽粤人”言语虽不一致,而无所谓“吴楚闽粤文字”为例,说明汉语书写语言跨时空的稳定也正是中国“秦汉以来统一已久”的原因,“故中庸曰书同文不曰言同文”。^[13]显然他认

为“国文”是与国家能否长久统一息息相关的问题。^[14]

这种心情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议论稍稍有点不对题。因为“国语”云者,其目的在于造就一种全民族使用的共同语。方言固然不可能消灭,但共同语一旦建立合法性,它是具有强制作用的,能把地方习惯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当然,在这方面,国语信奉者并不是没有难题。尽管语音已经规定,可以推行,但究竟何为国语,谁也说不清楚。1917年1月国语研究会成立,国语运动正式发动,同时布告《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暂定章程》,并附“征求会员书”,其中说道:

同一领土之语言皆国语也。然有无量数之国语较之统一之国语孰便,则必曰统一为便;鄙俗不堪书写之语言,较之明白近文,字字可写之语言孰便,则必曰近文可写者为便。然则语言之必须统一,统一之必须近文,断然无疑矣。^[15]

这份文件应该代表着研究会的一般认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面提到“国语”需要“近文”,也就是说,必须以某种书写语言作为基础,否则根本无从“统一”。这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思路已经有了根本不同,晚清白话文作为知识阶层开启民智的工具,一般来说多是采用尽可能接近口语的白话语体。此时提出国语“近文”的要求,是要用书写语言规范口头语言。不过问题在于,“国语”的范本从何而来?白话尽管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历代变迁,方言渗透,文体的惯性影响了语言表达的扩展;再加上近代以来社会转型,新事物、新的表达需求不断出现,根本就不敷使用。除此之外,当时正式的书写语言都是文言,尽管已经有非常松动的文言,但其性质显然是不基于口语的。

也正在国语研究会成立之时,1917年元旦,《新青年》二卷五号出版,其中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紧接着一期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文学革命正式发难。而到3月份,胡玉缙就敏感地意识到,“公等日日在中国,日日以国文为仇乎,岂惑于某氏文学革命之说乎”。^[16]第一次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联系起来。

事实上,在当时,这两个运动是没有关系的,至少胡、陈二人并没有关注

到国语运动。也就在国语运动诸君与胡玉缙开始争论的1916年9月,有人写信给《新青年》讨论“国语统一”问题,陈独秀回答说“兹事体大……此业当期诸政象大宁以后,今非其时”,^[17]显然兴趣不大。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晚清拼音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两不搭界。因为无论是拼音化运动还是国语运动,都有个方案、标准先行的问题,或者说,这也是这些运动的最终目的。而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重心皆在于围绕着某种主张进行实践,并不存在需要谁来批准、哪个机构来承认并推行下去的问题。所以国语运动的发起者,首先想到的是“凭借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底权力”等等;而胡适和陈独秀之发动文学革命,根本不会考虑要依赖什么样的力量。

《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思考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但偏重点很不相同。《文学改良刍议》所提八事,虽然有“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等内容上的要求,但重点还在形式方面,也就是所谓“工具”上的改革。这“八事”,其实在1916年10月寄给陈独秀的信中已有完整陈述。这封函件同时引了陈独秀的话:“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18]

陈独秀对西方文学史是有所了解的。早在1915年年底的《青年杂志》中,他就写过两篇《现代欧洲文艺史谭》^[19],介绍了欧洲文学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到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历史。到《文学革命论》,论述背景显然深受这一思路的影响:其推倒者,是古典文学,其建设者,则为写实文学。至若国民文学,则标以平易抒情;而“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与胡适倾向接近。但他并没有用“死”、“活”来评述中国文学史,只批评“阿谀”、“雕琢”、“铺张”、“空泛”等事。^[20]相对而言,陈独秀更倾向于从文学精神、文学思潮方面立论,而胡适显然集中精力于“文字形式”。

尽管陈独秀自称“甘冒全国学究之敌”,但他的文学主张并没有引起太多的议论。而胡适,由于“文字形式”方面的主张相当绝对,尤其其中“不用典”、“不讲对仗”两条,以及废骈废律的思路,马上招来热闹的讨论。《文学改良刍议》尚未发表,胡适那封给陈独秀的“通信”就出现反对的声音。江亢虎给胡适去函,论证绝对禁止用典之不可能,这造成《文学改良刍议》在讨论用典时立场有所后退;^[21]常乃惠也给《新青年》写信,反对废骈文、废用典,认为“吾国骈文,实世界唯一最优美之文”,他认为这是由汉字的特点所

带来的汉文学的优势。陈独秀当然不同意这种看法：“结构之佳，择词之丽，文气之清新，表情之真切而动人，此四者其为文学美文之要素乎。”但他对于“文字形式”的看法比较持中，“行文偶尔用典，本不必遮禁”。^[22]

其后不久加入阵营的钱玄同，在这一点上就直截了当得多。对于这样一位“声韵训诂学大家”的降心相从，陈、胡自然既意外又高兴。钱玄同首要赞成的，就是“胡先生‘不用典’之论最精”。就文献修养而论，钱玄同当然要比胡适强得多，但他的观点也更极端，此时之赞成文学革命，立场与其师章太炎相离已不可以道里计了。有趣的是，他取以论证的资源，却大多来自太炎的文论。他认为不应用典，尤其应用文中要彻底禁绝用典，就提到所谓“表象语”的问题，这是世纪初章氏《文学说例》中所使用的理论；而赞成为文不避骈散，悉由自然，同时反对桐城派和选学派之古文和骈文，也是其师的主张；至于胡适的废律，在他也容易接受，因为章太炎本就推崇古体而不喜近体。^[23]这在现在看来颇具讽刺意味，就“文字形式”而论，章、胡的具体看法竟然多有相合，那么两人的区别就只在最后的结论了：章太炎找到魏晋诗文，胡适找到宋元以来话本语录。这让钱玄同论述起来相当轻松惬意。

在“文字形式”方面，《新青年》诸人主张废典、废律、不讲对仗，彻底解放旧文体的束缚，但没有涉及“废韵”。从第二卷第六期开始刊登胡适等人的白话诗词，都是押韵的，而且每句字数全依旧体的格局。尽管从总体上看，这些文字是白话无疑，但很难避免让人用读古诗词的节奏来读，而且俗语词缺乏诗味，格调确实显得不高。当时胡适之所以选诗歌作为突破口，是有他的理由的，小说戏曲历史上多有用白话作的，而诗歌却少有人这么做。只是既为诗，总是以有韵较为合理。到刘半农加入《新青年》阵营时，还和钱玄同很认真地讨论过制订新韵的问题：“希望于‘国语研究会’诸君，以调查所得，撰一定谱，行之于世。则尽善尽美矣。”^[24]

远在美国的胡适，不久也知道了“国语研究会”的存在，“知国中明达之士皆知文言之当废而白话之不可免，此真足令海外羁人喜极欲为发起诸公起舞者也”。^[25]这年年底，胡适加入国语研究会。据说，他的申请书是从美国寄来的用白话写的明信片，让研究会那批主张国语的人感觉有点不习惯，因为他们尽管主张国语，却从没有用“国语”写过文章。受这张白话明信片的刺激和鼓励，研究会同仁终于立志以身作则用“国语”写作。不过，谁也

没见过国语的范本,只好“从唐宋禅宗和宋明儒家底语录,明清各大家底白话长篇小说,以及近年来各种通俗讲演稿和白话文告之中,搜求好文章来作模范”。^[26]

其实这很可能是胡适“无心插柳”。大概他觉得向“国语研究会”写申请,总应该特别用白话才行。也就是这一年,他和《新青年》同仁一样,撰“文”用的都还是文言。后来黎锦熙替他们算过一笔账:

这年陈仲甫主撰的《新青年》杂志,首先提倡“文学革命”,第一篇是胡适底《文学改良刍议》(二卷五号),第二篇是陈仲甫底《文学革命论》(二卷六号),第三篇是刘复底《我之文学改良观》(三卷三号)。但这三篇都是文言文,其他白话作品也很少;如胡适所译的短篇小说《二渔夫》(三卷一号),刘复译的短剧《琴魂》(三卷四号),陈仲甫在北京神州学会讲的《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三卷三号),又在天津南开学校讲演的《近代西洋教育》(三卷五号),这几篇虽然都用白话,但小说戏剧和讲演稿之类,向来照例也多用白话的;讲到文艺底创作,只有胡适底白话诗(二卷六号)和白话词(三卷四号),然而还是因袭旧诗的五七言和词牌;至于白话论文,只有刘复《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三卷五号),钱玄同与陈仲甫论文字符号和小说的信(三卷六号),勉强可以算得,此外便没有了。^[27]

其实,《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根本就是文言,而钱、陈在三卷六号上的“通信”倒真是白话。之所以有这样的“特别”倒不在于“论文字符号和小说”,而是这一“通信”同时也论及了《新青年》是否应该全部改行白话,那当然不好用文言写。出现这个特殊情况的原因,和胡适那封白话明信片大体相似。

1917年《新青年》书写语言的状况,确如黎锦熙所说,白话的成绩并不大。对于这不多的白话作品,他指出的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那些用白话作的小说、戏剧、讲演稿,“向来照例也多用白话的”;一是胡适的白话诗词“还是因袭旧诗的五七言和词牌”。

这两句话实际上涉及文体对语言选择或“文字形式”之限制问题:小说戏剧,宋元以来多用白话,相沿而及,已成传统;演说一门,系属章太炎提及

的“口说”一路，自然以口语体为正。当然，到了近代，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主要是外来的影响。比如戏剧，译入的都是话剧一类，当然已没有了中国传统戏剧的曲牌，加上舞台的要求，对白只能译成非常接近口语的白话；再如小说，逐渐经历了叙事模式转变的过程，很多文体特征逐渐消失，章回小说中如“话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的套语慢慢看不到了。但毕竟小说、戏剧都有白话的传统，无论是翻译还是创作，选择白话语体并不困难。所以，胡适发动文学革命，选择韵文作为突破口时说：“盖白话之可为小说之利器，已经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实地证明，不容更辩；今惟有韵文一类，尚待吾人之实地实验耳。”^[28]实际上他所要对抗和破坏的，就是韵文，尤其是诗中的文言传统。但要说起来，仍用五七言及词牌确实不能称之为彻底革命。

如果按照后来所形成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四大分类法来看，文学革命发难初期的胡适，似乎独对于“文”没有投入足够的注意力。尽管抨击骈文、古文，但新的“文”应该是什么样的，他缺乏论述。而恰恰是“文”最缺乏白话的传统。我这里指的是作为“文辞”而非“口说”的文。他所说“今惟韵文一类”，大概是把小说作了“散文”的代表，《文学改良刍议》以施耐庵曹雪芹为“文学正宗”，“八事”中有“不避俗语俗字”，其所取用的外来资源，为但丁、路得之以“俚语”著述，而成就意德之“国语”。^[29]胡适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篇文章全为文言，自己是在用“死文字”倡导“活文学”。

也许，这与胡陈最初所要进行的是“文学革命”而非“文字革命”有关。胡适最初在美国讨论的是文字的“死活”，但后来注意力很快转到文学的“死活”。对于“文学”，他和陈独秀以及后来加入的刘半依等人都有很深的来自于西方的影响。“文学”一词的使用，《新青年》同人一直非常统一；只是在《青年杂志》时代，陈独秀用过“文艺”，但显然都等同于 literature。而西方文类中，散文一直是边缘化的。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说：“现代欧洲文坛第一推重者，厥惟剧体，诗与小说，退居第二流……至若散文，素不居重要地位。”^[30]其后回答常乃惠通信，区分了“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31]这也是西方的思路。因而他回应胡适的文学革命的倡议，所讨论自然在“文学之文”，而不在“应用之文”。至若《新青年》上同人们的立论驳论，那都是“应用之文”，再加上文体的惯性，无所注意也是可以理解